

党史资料

丛刊



第一辑

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

一九八二年
第一辑
(总第一〇辑)

文 物

聂荣臻同志关于南昌起义部队情况

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(4)

回 忆 录

江 苏 省 委

十年内战初期江苏省委领导下的

一些斗争 刘 晓 (6)

党在浙江的活动

党在浙江的早期活动 徐行之 (18)

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、团组织

在浙江沿革情况的回忆 邵荃麟遗作 (24)

地下交通工作等

回忆解放前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李沛群 (28)

关于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几点回忆 高文华 (33)

华中局情报部的秘密交通工作 何 莘 (37)

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开展外国兵士工作
的情况江闻道(43)

新 四 军

新四军淞沪支队的由来与发展朱亚民(48)

教 师 运 动 等

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教师运动马飞海(58)

关于上海神州职业夜中学的片断回忆朱启奎(78)

工 人 运 动

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董锄平(82)

一九三三年上海工人联合会的工作陈艺先(88)

一九三〇年沪西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工人
的罢工斗争陈 林(90)

一九三二年英商公共汽车公司
的罢工斗争顾永才(93)

人 物

太雷轶事 羊牧之(96)

专题研究

关于一九二八年两次浙江省党代大会问题

的初步考证 沈自强(108)

上海反战大会的始末 倪墨炎(113)

关于陈独秀出狱后给《申报》馆的信 唐宝林(130)

高敬亭功过述评 童志强(137)

人物介绍

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(续完)

..... 向 青 石志夫 孙 岩(145)

大 事 记

闽西革命根据地大事记 孔永松 林天乙(169)

动 态

上海党史资料工作正在逐步展开 时 宣(198)

封面装帧 范一辛

聂荣臻同志关于南昌起义部队情况 给中央军委的报告*

(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)

钧甫^① 兄：

本日□时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，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，复被十八师追击，在该地应战。我军本占优势，但士第下令退却，然行动不一致，损失颇大。经过此役，现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，枪支在一千以下，机枪两挺。及退至信丰时，兵士疲倦已极，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，虽然曾派有赵自选去，恐亦未曾赶上。因此，士第及三个团长与李陶等均先后离队他去（闻系该军党部决定的），现由玉阶负总责指挥。七十三团由一肖营长^② 负责，七十四、七十五两团由参谋长代理，改编为四个支队，拟开至崇义去。但七十五团参谋长张启图，系南昌事变时加入的人，本不甚可靠，闻与七十三团参谋长勾结，

* 原无题。此题系编者所加。

① 钧甫，即“军部”二字的谐音，“军部”，指中央军委。

② 肖营长，即七十三团一营营长肖泽禄。

意欲脱离他去。我恐士第走后，军事及党部方面，均无重心，恐玉阶不能指挥。来人云，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：“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，可以走，我虽有十支八支枪，还是要革命的。”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。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，我的意见，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，与湘农民会合，但有一层危险，就是玉阶既不能全掌握部队，而兵士又多湘人，入湘后部队更难维持了。如何是好，须待与代英毛子共商量决定办法。

荣 臻

十一月四日^①

^① 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发于香港。此信已和本人核对，系荣臻亲笔。

十年内战初期江苏省委 领导下的一些斗争

刘 晓

一九二七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发生后，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。那时，我在法南区委西门路党支部。组织上下了紧急通知：党员一律不能随便外出，注意荫蔽，尽量设法转移住处。五月，法南区委的闵廉同志通知我：党中央号召党员转移到农村，组织农民暴动来开展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斗争。不久，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奉贤，并和李主一同志接上了关系。这样，我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。

一、奉贤县委的工作和庄行暴动

我是和刘德超同志一起调到奉贤的。到那里后，先是通过李主一的关系，我们被聘为奉贤县教育局举办的小学教师进修班的教师。经过三个月的工作，我们团结教育了一批学生，如朱文熙、陈枕石、李定扬、唐一新等，其中有的同志后来成为当地农民暴动的骨干。

进修班的工作结束，李主一留我们在奉贤工作，要我们到奉城

曙光中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,开展革命活动。曙光中学是李主一、金学成、宋亚等党员创办的,大革命时期成为奉贤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,校内有党、团组织,教员中有很多进步人士。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江苏省委又陆续将一些党员荫蔽在曙光中学内,如方厚生、范志超(侯绍裘同志的爱人,侯牺牲后,她和弟弟一起到曙光中学)、李伯殷(文学家)、顾凤城(文学家,后脱党,在叶圣陶办的书店当编辑)等。刘德超和我到了那里,刘担任训育主任,我担任过国文、英文、历史课教员。

后来,根据江苏省委决定,成立了奉贤县的曙光中学中心支部,我是支部书记。一九二七年秋又在这个基础上,成立了奉贤县委。县委由李主一、刘德超、方厚生、范志超和我组成。我担任县委书记,李主一任组织部长,分管上层工作;方厚生是宣传部长,分管群众工作;刘德超任军事部长,分管海边土匪的工作。曙光中学校长徐宗骏(又名徐雅平)那时也参加了党,他虽然不是县委委员,但常列席县委会议,县委指定他协助李主一开展上层工作。奉贤县委的成立,标志着奉贤地区党的活动,已度过了“四·一二”以后的低潮,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阶段。

奉贤县委成立后,党的力量有很大的发展。不仅县城南桥有党支部,小庙、青村港、庄行、沈家桥、西乡等地都有党支部,有党员几十人。曙光中学是县委机关所在地,也是全县工作的主要据点。曙光中学的师生,被派到各乡去宣传组织群众,发动农民抗租抗捐的斗争。

当时,江苏省委书记先是罗登贤同志,后是任弼时同志,我都曾见到过。党的“八七”会议后,我曾向任弼时同志汇报过工作。我提出要抽调党员和积极分子,在曙光中学加以训练后,分配到各地搞农民运动。任弼时同志对我的打算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,但他提出:这样搞能持久吗?群众能接受吗?他关照我们要小心谨

回忆录

慎,要落地生根,要搞好群众关系、地方关系、上层关系。可是,在实际工作中,我们忘记了他的嘱咐,往往急躁盲动。为了开展群众工作,曙光中学后来连课也不上了,教师、学生都要下乡去发动农民,校歌采用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曲调;学生办的墙报上公开讨论共产主义等等。有的同志对这些做法有意见,认为这样搞下去,我们会站不住脚。而我们却认为这样才是“真正的革命”,才是贯彻“八七”会议精神,反而批评了这些同志。一九二八年四月,曙光中学终于遭到了敌人的查封。敌人乘清明节学生放假、教师大多离校的机会,搞了个突然袭击。我们左倾盲动的结果,损失了一个重要的据点。

一九二八年初夏,李主一赴沪和江苏省委联系工作时,省委机关遭破坏,他也被捕。开始,敌人并不知道他的底细,后被奉贤的大地主告密,他被害牺牲。

曙光中学被封以后,方厚生、刘德超、范志超等县委成员先后去上海,李伯殷、顾凤城也脱离了党组织。省委指示改组县委。我还是担任县委书记,县委其他成员有李定扬、老乔(留日学生)、周大根和金大块头。之后,县委成员都分散在乡下活动。

一九二八年,上海郊县农民武装斗争蓬勃开展。金山枫泾、青浦小蒸、嘉定六里乡等地都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。同年秋,江苏省委设立了淞浦特委,统一领导松江、青浦、金山、奉贤、南汇、川沙、嘉定、崇明等上海郊县的党的组织。特委书记先是林钧、后是陈云(当时叫廖陈云)同志。

我们奉贤县委象其他郊县一样,也在积极准备发动武装暴动。由于基层干部的努力工作,深入群众,当时奉贤地区党的力量发展得相当快。四团、小庙、青村港等党支部的党员都有二十个左右,庄行支部党员有几十个,新场附近的东新市有党支部,离开海滨三、四里地的盐民中也有党员,党的组织发展到了亭林、柘林一带。当

时，也涌现了一批基层干部和党员骨干，如马祖援开辟了小庙工作，唐一新、冯阿二、吴国天等在庄行一带活动，还有苏锡桃和他的二个儿子阿大和阿二都是党员，在小庙和盐民中工作。一九二八年冬，全县党员已发展到二、三百人。

于是，县委决定发动农民武装暴动。我们并没有认真分析敌我力量的具体对比，也不细致考虑暴动以后怎么办，就是一心想搞暴动。所以，那时的暴动实际上是盲动。开始，县委决定在四团先搞，因为那里有一个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。我们认为只要把这个地主镇压掉，群众就会发动起来了。结果打掉了地主，敌人马上加强力量镇压，周大根等被捕，还有些党员被迫出走，党支部只能搞分散活动，困难很大，支部负责人对县委的决定也产生了意见。于是，我们就把斗争重点转移到西乡，决定发动庄行暴动。

我曾经到上海向淞浦特委书记陈云同志汇报庄行暴动的计划。我强调条件都成熟了，陈云同志则认为：地处敌人的后方，如果搞起来要站住脚是不可能的。为了保证暴动胜利，我要求特委派干部去加强领导，他答允了，但他强调说：“派人给你是有条件的。你们的力量不见得比人家大，估计暴动以后，你们在那里是站不住脚的。如果形势恶化，包括你自己在内，主要干部可要撤回上海，千万不能呆在那里呀！总之，保存骨干要紧。”那时，组织上派了严朴、杭果仁、蒋云等到奉贤，具体领导庄行暴动。我们在上海买了枪，由姜兆麟、姜辉麟姐妹俩负责运送到奉贤。严朴还会造土炸药，他在上海配好料，带到庄行，秘密制造土手榴弹。

一九二九年一月的一个晚上，庄行武装暴动打响了。我们率领了暴动队伍，首攻目标是庄行的警察局。愤怒的农民，士气高昂，依靠几枝枪和土手榴弹、假机枪（火油箱里装鞭炮），暴动队伍顺利地缴了警察局、商团、保卫团的枪，占领了庄行镇。接着，我们就冲到地主、豪绅家里搜找单契、字据，当众烧毁；并放火焚烧了反动机

关和地主宅院的房子。

果然不出陈云同志所料，暴动即使成功，在庄行也是站不住脚的。敌人从南桥方向打过来。农民武装和敌人在南桥打了一仗，敌人退回去了。但没有几天，国民党从江苏、浙江调来了大批正规部队直向庄行扑来。农民武装怎么能顶得住呢？于是分了二路：有些人荫蔽下来，有些人经枫泾往天目山方向撤退。庄行重新被敌人占领，暴动就此失败。

庄行暴动失败以后，我和唐一新、李定扬、老乔、金大块头等一起撤到上海，住在法租界斜桥余庆里。我们向淞浦特委和省委写了一个关于庄行暴动的总结报告。内容大致是奉贤农民群众的痛苦生活、武装反抗地主的情绪和要求、组织暴动的经过以及取得的胜利成果等等。省委对于庄行暴动一般是赞扬的，但也有个意见认为负责人不该过早撤退。关于今后工作，省委认为应该巩固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，以小游击队的形式，分散打击敌人。

不久，省委要我们根据党的“六大”关于“争取群众，不是组织起义”的精神回去取消暴动计划，组织一般性的群众抗租抗捐斗争。当时，奉贤县委是个中心县委，也管南汇、川沙的工作。所以，我到南汇的新场、老港一带去，也到了奉贤的东乡。我一讲全国形势和取消暴动计划的决定，干部和积极分子都表示拥护，但大家对发动抗租抗捐斗争的信心也不大。有的干部认为要搞就要大搞，一点一点地搞，是斗不过地主的。因此，抗租抗捐斗争实际上并没有发动起来。

我回上海向省委作了口头汇报。那时，省委书记仍是任弼时，他到我的住处来过一、二次。省委的杭果仁、严朴、蒋云也经常和我联系。不久，省委组织部派黄百川来联系，一九二九年春，省委决定调我到中央办的干部训练班去学习。奉贤中心县委书记由李定扬暂时代理。

二、参加中央干部训练班和被捕

参加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大部分是地、县委的负责人，也有一些其他干部。我参加学习的那期训练班的负责人是省委书记李维汉。主持训练班日常工作的是曾宗圣（曾希圣的哥哥），由他出面在新闻路上（戈登路往东）租下了两座双开间的弄堂房子，作为训练班校址。保卫工作由特科负责人陈赓和刘鼎等负责。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危险，训练班中每个人的身份、相互关系、所住的房间等，都预先作好安排：如曾宗圣是“房东”，其他人都自称房客，有的人住亭子间、有的人住灶披间，“房客”之间的相互称呼也预先确定，甚至还作过应付紧急情况的演习，但始终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。训练班纪律很严，平时不许外出。

周恩来同志每周都要到训练班来一、二次，并亲自为学员讲课，政治形势课就是他讲的。恽代英、罗迈、曾宗圣也担任讲课任务。农民运动课好象是彭湃、杨殷讲的。

在训练班学习，收获是不小的。我们学习了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当时的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，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当前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，不是组织起义，而是争取群众，实现十大纲领，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等“六大”决议的精神，并根据这些精神整理了自己的思想。我觉得思想认识提高了不少。

学习一个月左右后，一九二九年五月，训练班结束后，按秘密工作的原则，由主任事先安排好各人离开的次序，分批依次离去，不许相互告别，到外面后也不许参加当月的“五卅”纪念活动，以防万一有人被捕泄密。分配到苏区和回地方工作的干部，很快离开了上海，其余干部，在新的住所等候中央分配工作。

我从训练班出来，李维汉代表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，分配我在组织部工作。后来，又通知我暂缓报到，考虑另行分配。于是，我仍回奉贤担任中心县委书记，没几天，奉调返回上海。

一九二九年七月，黄百川来和我接头，分配我到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行部工作，由我负责一个分发宣传品的机关。当时，共产国际公开号召在八月一日举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罢工示威运动，向世界帝国主义作总示威，并称之为“国际赤色日”。我党中央即决定八月一日以“拥护苏联”、“拥护殖民地革命”、“反对帝国主义大战”为中心口号在上海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并正式宣告反帝大同盟的成立。但不到八月一日，敌人已经下手镇压了。七月二十八日，我回家还未进门，就被守候着的包打听逮捕。他们还在我家搜获了两箱宣传品。法租界当局开庭审判时，互济会请了一位律师为我辩护。原先要判我是共党案，因无证无供，最后以“私藏非法团体传单，准备在法租界散发，危害治安”为罪名，判我一年徒刑。一九三〇年九月间，刑满时也不叫办什么手续，宣布“驱逐出境”（即逐出法租界）。巡捕将我押到英租界释放后，互济会派人接我，后住到专门安顿出狱同志的招待所里。

三、王明路线时期的江苏省委

我到招待所后，经过组织上的审查，很快就恢复了组织生活。一九三〇年秋，立三“左”倾错误受到批判。当我们听到关于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“左”倾错误进行批判的传达以后，都很高兴。在招待所的党支部会议上，我发表意见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定，并且就自己受到的盲动主义的影响，作了自我批评。不久，我被调到江苏省委去工作。

当时，全党都在批判立三“左”倾错误。立三“左”倾错误首先

表现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。当时，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激化、全国大灾荒和新军阀打内战引起天怒人怨等等，的确对革命有利，但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高潮的阶段。李立三却认为“革命高潮快到了，在有的地区已经出现了”、“国民党的政治危机极端严重”、“群众要求大干”；因而主张“取得一省或几省的胜利，直接准备迎接革命高潮”，布置城市中的罢工、罢课、示威游行；红军进攻大城市；士兵搞“兵暴”等盲目行动，结果，脱离实际，脱离群众，牺牲了许多好同志。李立三取消了党、团、工会组织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，以贯彻他的盲动计划，并排斥、打击怀疑他的同志。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“左”倾盲动主义，指出了立三对革命形势估计错误、取消党团组织、盲目暴动、党内个人专断等错误。后来听说中央改组，李立三下台，由瞿秋白主持工作；不久又听说瞿秋白没有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反对立三错误，也下台了。那时，中央名义上还是向忠发负责。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调走后，老的省委改组，新的省委未成立前，陈云同志临时主持过省委工作，但时间很短，后由王明接任。

我先到外县工作委员会担任秘书。外县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原由省委书记李维汉兼任，后来先后由陈云、夏曦、蒋云担任。外县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是刘瑞龙。省委决定派人到外省、外县去停止执行立三“左”倾错误的暴动计划时，我被派到常州、宜兴一带去。我到常州和县委同志一谈，他们表示完全同意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本来就很难组织起行动委员会来”。常州县委当时只有三、四人，敌人对常州控制很严，的确很难组织暴动。我到宜兴，县委同志约我在常州和宜兴之间的小镇和桥碰头。他们说早该吸取教训，暴动本来就是搞不起来的。本来还要到镇江去，结果省委交通员催我回上海。到了上海，原来是苏州的一个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，我同他谈了停止执行暴动计划，他举双手赞成，第二天就回去了。跑

了几个地方,更加感到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,搞盲动主义,根本没有客观基础。

一九三〇年底,我接替小阮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。那时的省委秘书长,实际上只负责秘书处的文件、发行、交通等事务工作和财务工作,文字工作都是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动手的。秘书处的机关设在老靶子路(今武进路)十号(小阮任秘书长时已在这里),后来搬到北四川路一家布店楼上的写字间里。

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(苏北人,和曾任党中央书记的王稼祥同名同姓)、彭寿仁(湖南人),负责财务工作的是彭休士。彭休士管理省委的经费,他和罗迈、王明直接联系,钱存在哪里、有多少,都不用我管。那时,省委的开支主要是汇给各县的经费(或托人带去);各区的经费分头发给区委书记。秘书处油印文件、交通、密写等等所需经费由我每月造了预算,经省委书记批准,由彭休士支付。

除了秘书处的工作外,我还要和中央特科经常联系。中央特科派来联系江苏省委的是刘鼎(现在三机部任顾问)和吴先青。我当时住在华德路一个电料行的楼上。王明一家当时住在海宁路一幢三层楼房子里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,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,实际上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。以后,中央决定改组江苏省委,并由王明担任省委书记。陈云是省委组织部长,夏采曦是省委宣传部长,康生是工会党团书记兼管特科。潘汉年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也管特科。特科的工作是直属中央领导的,由中央派人和潘汉年直接联系,省委不另外设立特科机构。省委军委书记是李硕勋、妇委书记是刘群仙。

当时党内矛盾很尖锐,很复杂。主要是罗章龙、徐锡根、王克全等人非法成立“第二中央”“第二省委”,搞分裂党的活动。何孟

雄、林育南等也另行组织，反对四中全会和王明。王明当省委书记，他们不承认，说王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，没有资格做省委书记。王明写的《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》等小册子，他们根本反对。王明召集他们开会，他们只来一部分，在会议上发表对抗意见，后来王明就不通知他们参加会议了。王克全纠集一些人还闹了一场企图占领省委机关的闹剧。江苏省委改组以后，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老靶子路十号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里来。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、会议记录和经费。当时，彭休士和我都在场。我们拒绝交出，他们就吵吵嚷嚷，不肯罢休。后来，潘汉年赶来了，说这样争吵引起了敌人的注意。王克全他们怕出事情，不得不溜之大吉。事后，我马上将他们要占领省委机关的经过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。

王明当了省委书记后，直接从中央调一批干部由省委使用。事先，陈昌浩、李竹声在王明家里和王明密商人选，后来就向中央点名要这批干部。陈昌浩、李竹声、殷鉴、朱阿根、潘问友等都是他们向中央要来的。这些人到江苏省委以后，王明就将上海各区的区委书记作了一番调整，不听话的撤职、调动，由这些人接任。如陈昌浩到沪东区委、朱阿根到沪西区委、殷鉴到沪中区委、焦××到闸北区委、夏曦到法南区委。这五大区委都由王明派人控制，原来的区委书记或调动或担任区委委员，这样，王明就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。凡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，他就一律加以无情打击，从批评直到撤职。有时还采取断绝经济供给的手段来压服别人。我曾奉王明的命令到沪西区委去谈判，要区委同志不要“反对省委”，否则，就不发给生活费。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，没有任何收入，为生活所迫，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。

王明的《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》、《对 96 号通告的意见》等，都是在江苏省委书记任内写就，提交中央讨论的。那时，

回忆录

他主要强调这样几点：第一、任何群众运动都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斗争目标；第二、任何群众运动都要提到反对资产阶级的高度；第三、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一般的政治口号要并列；第四、没有群众斗争就没有经常工作，凡斗争就要搞罢工、示威游行等活动。这些“指示”，都要各区贯彻执行。下面思想不通，阳奉阴违，王明就召开会议检查工作。在会上，他要大家检讨工作，有人提出对形势和中央精神不了解，工作中并有具体困难，他就夸夸其谈地讲一通大道理，说什么要从全世界、全国形势来看待具体工作等等，空空洞洞，似是而非，弄得大家都无可奈何。

那时“九·一八”、“一·二八”接连发生，国民党营垒内部分化，冯玉祥、十九路军等不听蒋介石的指挥，纷纷起来抗日，中间派都拥护他们。但王明他们认为这是敌人的欺骗阴谋，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，要和中间派划清界限，不能和宋庆龄、冯玉祥等接触。十九路军在前线面对面地和日军作战，对全国的影响很大，群众拥护他们，而王明他们却提出“反对中间派”的口号，当然不得人心。那时，各地水灾严重，我们不提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有关的斗争口号，却要动员群众“拥护红军”、“拥护苏维埃”、“拥护苏联”、“打倒一切帝国主义”，群众当然不能接受。由于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错误，丧失了时机，葬送了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，孤立了自己，对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。

一九三一年四月，我第二次被捕。事先，特科已发警报说我们被注意了。彭寿仁就在华德旅馆开了房间，并把他的母亲和弟弟接去做掩护。我则约了人在那里碰头。一天，当我走进旅馆，即被包打听逮住。那时，彭已被捕，后来进来的王稼祥、张平也同时被捕。原来，彭寿仁将宣传品和《红旗周报》放在枕头底下，正好被查房间的包打听搜到。一行四人先被解到公安局，后被解到警备司令部，虽然受尽重刑，但大家前后口供一致，坚持互不相识，